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社会转型与中国经验

李培林◎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3033336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D616-53
30

社会转型与中国经验

李培林◎著



D616-53

30



北航

C163977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转型与中国经验/李培林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ISBN 978-7-5161-2058-3

I. ①社… II. ①李… III. ①社会转型—中国—文集②社会发展—中国—文集 IV. ①D616②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296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出版策划 曹宏举
责任编辑 王 茵
责任校对 孙洪波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5.25
插 页 2
字 数 401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光	刘庆柱	江蓝生	李 扬
李培林	张蕴岭	陈佳贵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晋保平	程恩富
蔡 昉			

统筹 郝时远

助理 曹宏举 薛增朝

编务 田 文 黄 英

前 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57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133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目 录

社会转型理论研究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	(3)
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22)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	(35)
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其出路	(52)

社会学学术史研究

现代化的求索:启蒙、进化与改良	(79)
20 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126)
20 世纪上半叶唯物史观社会学	(146)

中国经验研究

社会学和中国经验	(163)
改革和发展的“中国经验”	(192)
城市化与我国的新成长阶段	
——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202)

社会分层研究

- 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若干问题 (225)
- 中国改革以来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 (258)
- 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
- 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 (283)

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研究

- 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若干问题 (309)
- 大众消费阶段与社会改革 (324)
- 法国福利体制的危机及对我国的启示 (335)
- 让农民的住宅进入市场 (351)

乡村发展研究

- 巨变:村落的终结
- 都市里的村庄研究 (357)
- 透视“城中村”
- 我研究“村落终结”的方法 (378)

社会转型理论研究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转型的标志是：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等等^①。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从理论上作进一步的阐述。

人们一般认为，就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力量而言，存在着两只手：一只是有形的手——国家干预，一只是无形的手——市场调节。实际上，由于中国社会目前正处在一个结构转型时期，并且中国经济处于含义更加广泛的非平衡状态，因而对于中国来说，还存在着第三只手，即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就是社会结构转型。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整个社会转型时期，结构转型作为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将以它特有的方式规定着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资源配置的方向，这种力量用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都是无法概括的。在一般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推动力，而在新旧两种体制的转换过程中，这种力量的作用日趋明显。

一 社会转型的概念界定

（一）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

在描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时，“增长”和“发展”这两个概念常常被交替使用。在很多场合，它们是可以互相替代的。然而，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区别，代表着两种发展观。

^① 参见陆学艺、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经济增长指的是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提高。只要一个国家的商品产量和劳务量相对于人口增长来说提高了，就可以把它看作经济增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阶段，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上来，在理论上也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传统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主旨就是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数量增长为目标。这个时期在理论上出现了较有影响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罗宾逊增长模型、贫困恶性循环论、大推进理论等等。联合国在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中，也规定了不发达国家的基本发展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不低于6%。1969年应世界银行的要求提出的“皮尔逊报告”以及1970年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所提出的“廷伯根报告”，也都代表了这种传统发展观，即认为经济的增长是发展的捷径，只要把蛋糕做得大一点，就可以有更多的剩余分配，从而最终消除贫困现象。此外，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在殖民体系崩溃以后继续享有传统的原料供应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也运用各种手段把第三世界纳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并希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效果能够有“示范效应”。基于这种背景，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理论界存在着普遍的“增长热”，报纸、广播和政治演讲中充满了各种关于经济增长的词汇。

但是，到70年代初，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出现“滞胀”的困难局面。不可再生的资源大量消耗，片面增长带来环境的日趋恶化，受害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战后几十年的实践表明，单纯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真正消除贫困，而且由于发展的畸形，造成贫富悬殊、利润外流、债台高筑、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等等。平民教育、社会福利、医疗保健、生态环境、社会公平等社会进步因素都被当作经济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在此情况下，曾经一度在欢快的气氛中十分响亮和时髦的“增长”一词，似乎突然蒙上了悲观的色彩。

“无发展的增长”这句名言大概是对以上状况的精辟概括。它表明，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应该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社会秩序等各个方面，其中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是发展的最本质内容。

（二）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

在描述社会转型的理论中，“传统”是一个被用滥了的术语。它往往被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类型，与落后的、不发达的、静止的状态相联系，从而带有贬义。与传统相对应的另一端是现代社会，一切先进的、发达的、动态的特征都被归于这种类型，所以说，在西方古典的现代化理论中，把社会结构的类型分成对应的两极是一种“通病”，如梅约的身份社会和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社会和“有机团结”社会，莱德菲尔德的民俗社会和都市社会。韦伯的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贝克的宗教社会和世俗社会，等等。所有这些社会类型二分法学说最终得到一种经典的概括，社会被归结为“传统”与“现代”两种基本类型，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只有一朝跨过才能进入现代社会。

事实上，在所有这些理论中，人们对“传统”的界定往往是十分含混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家们习惯于把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的理想类型，然后从这种类型的反面去推导传统社会的特征，似乎传统与现代之间是泾渭分明的，而在所有那些被称为“传统”的东西中，最具有传统特征的又是价值观、行为规范、心理状态、信仰等非经济因素或非物质文化。近三十年来，东方一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对这种“思维定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东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虽然已经达到发达或较发达的水平，但他们的民族精神、人际关系、组织管理方式和文化氛围等都还是很“传统”的，被称之为“东方特色”。与此同时，一些拉美国家和中东石油输出国，虽然建起了外观非常现代化的城市，有豪华的宾馆和出售高级奢侈品的商店，甚至人均收入也比较高，但人们仍普遍认为他们并不属于现代化国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实现现代化的因素并非是与自身文化传统的完全决裂，而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因为如果从深层意义上来理解，传统本身就是一个蕴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态积淀过程。古典现代化理论家由于在理解社会结构的含义时偏重于狭义的文化和囿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所以他们的某些结论往往背离了他们的初衷。

我们说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型变动，这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它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其他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二是指它是持续发展中的一种阶段性特征，是在持续的结构性变动中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世界银行顾问钱纳里在提出结构转换概念时所说的，“在描述经济发展的过程时，我们试图用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换这个概念，取代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二分法概念”^①；三是指它是一个数量关系的分析概念，是由一组结构变化的参数来说明的，而不仅仅是一般的宏观描述和抽象分析，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将作更加深入的探讨。

（三）社会转型是一个数量关系的分析概念

事实上，把数量分析引入对结构性变动的考察，这标志着人们对结构问题的一种重新发现。

注重社会结构和事物的空间安排，这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的兴趣。但直到进化论出现以前，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对社会结构的探索仍主要是一种静态研究。社会学的创立使人们把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与社会过程联系起来，即在研究社会运行过程中考察社会结构的变动。但是，那时人们的主要关注点是探索历史表象背后的统一规律。亚当·斯密在经济领域发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无疑是这种努力的重要结果，同时也为推动这种努力打了一针兴奋剂。但自此以后，人们对“统一规律”（如结构变动的三段式逻辑）的探索都没有超出抽象分析和经验观察的局限性。

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才在社会领域对结构问题重新有所发现。这种重新发现的标志之一，就是把数量分析引入对经济社会结构的考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在1966年推出《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他通过对大量历史统计数据的模型分析，对经济增长中的产值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国际依赖关系等诸方面的变动，都进行了多国之间的比较研究。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还对与社会结构的经济特征相联系的非经济特征（如人口格

^① 钱纳里等：《发展的格局》，李小青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局、政治结构、文化特征、社会整合程度等)尽可能地进行了数量分析^①。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论,从另一个方面引起人们对结构问题的重新关注,他从研究“劳动力剩余经济”入手,考察了“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相互联系^②。他用结构分析方法建立的二元经济模型,已成为人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结构变迁和转型的重要理论框架之一,这种理论框架对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劳动力转移、收入分配结构等具有特殊的意义。

事实上,把数量分析引入对经济社会结构的考察是对传统—现代二分法的一个有益补缺,因为它可以使我們更清晰地看到经济社会结构不同层面的变动时序和具体的变动轨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更具代表性的是钱纳里的研究。他正是通过经济增长长周期的数量分析在理论上把结构转变和工业化过程紧密地联系起来。早在 70 年代初,钱纳里根据掌握的统计资料,对 100 个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在“二战”后 20 年中(1950—1970)的经济结构变动趋势进行了数量分析。他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准,把发展过程分为从人均 100 美元到人均 1000 美元 9 个阶段,然后考察每一阶段上经济社会的 10 个方面共 27 个相关变量的变动趋势,以期了解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具有的结构变动特征。这 10 个方面被分成三大类:一是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二是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构成、生产结构和外贸结构;三是人口变化及分配过程,包括劳动力构成、城市化、人口变化和收入分配^③。

从 60 年代初开始,社会学家也在探索以数量指标考察社会结构的变动。那些描述现代化社会结构特征的数量指标,一般被称为社会结构转型的“临界点”。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 A. 英克尔斯在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6 个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抽样调查后,提出了现代化国家结构特征的 10 项指标。这个指标体系除选用了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外,还包括了成人识字率、大学生占人口比重、人口净增率、平均预期寿命等

① 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编著《现代经济增长》，戴睿、易诚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参见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施炜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 参见钱纳里等《发展的格局》，李小青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 页。

一些公认的重要社会指标，从而反映了社会发展观在近几十年中发生的深刻变化^①。

从以上我们对社会转型的概念界定中可以看到，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二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点

社会结构转型并非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特有现象，而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在历史背景、文化背景、资源背景等方面的特殊性，使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表现出若干不同于一般发展进程的特点。

（一）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步进行

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在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转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直接的动因是经济改革，这是确定无疑的。

首先，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促成各种新要素的产生和导入。在体制要素方面，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所有制结构，改革了原有的高度集权的组织体制，使生产管理体制、流通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价格体制、分配体制、外贸体制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规范要素方面，初步建立起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规范体系。这特别是指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市场的扩大使资源的流动性显著增强，以职业分化为主体的各种社会分化成为必然趋势，并随之产生各种新型经济——社会组织和职业群体。新的规范体系已不再是以管严管死为内在要求，而是以资源的合理流动为前提。在技术要素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引进各种先

^① 参见 Inkeles and Smyth, *Becoming Moder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进技术两万多项。在社会变迁中，技术是一切新要素中的主导要素。因为技术的发明创造所改变的，并不仅仅是生产能力，它会使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发生变化。关于这点，只要看看近十几年来家用电器的迅速普及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就会一目了然。在观念要素方面，商品观念、效益观念、时间观念、法制观念和社会参与等观念的形成，使人们的总体价值观念迅速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在拥有广播、电视、电影、广告、报纸、书刊、电话、传真、电脑网络等现代信息转载手段的社会中，这些新要素的产生和导入得到迅速的传播、扩散和生长，从而使社会结构在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或快或慢的变化。

然而，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从另一面来看，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旧的传统体制已被打破，社会现实在一些深层次上发生变化，过去的某些社会整合方式已不再适应现实的要求，而新的社会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新旧两种社会体制、秩序规范和机制的并存交替局面将会持续一个较长时期，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摩擦、矛盾和冲突会在一定时期内表现得异常激烈。另外，体制改革的过程从根本上说也是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在这种调整过程中，多数人会从改革中获益，但也有一部分人会暂时失去一些利益；放权分权的过程会使一些组织和个人失去原有的权力；在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由于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裕起来，会使另一部分人的相对收入地位下移。加之在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由于体制不完善而产生的利益分配不公等现象，都会使利益差距拉大的同时伴随着各种利益摩擦和冲突。与此同时，在结构转型时期，各种结构性要素都处于变化之中，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过渡性和不稳定性。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经济层面与社会层面之间、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之间，都会出现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最后，功能分化的加强和持续，社会流动的增加，社会晋升渠道的多样化，这些都使人们的身份和角色处在一种变动的状态，从各个层面上表现出一种“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往往使个人和组织丧失对自身角色及其角色规范的认同，陷入经常性的角色冲突中，如企业所陷入的作为行政主管部门下属和市场竞争主体的矛盾，乡镇企业工人所呈现的农民户籍身份和工人职业身份的矛盾等等。

总之，在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同步进行的情况下，结构冲突、角色冲